

李东阳佚作辑考

丁延峰

摘要:李东阳是明代茶陵派领袖,一生著述宏富。其诗文作品,有明清刻本抄本七种。今人据此所编有《李东阳集》(周寅兵点校)和《李东阳续集》(钱振民辑校),均由岳麓书社分别于1983年和1998年出版。两集约一百五十万字,将东阳作品网罗殆尽。然挂万漏一,亦所难免。笔者于专题研究之际,意外获得李东阳佚作四篇。佚作对研究李东阳的生平、交往和思想都不无裨益。

关键词:李东阳;辑佚;考证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2-0043-06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祖籍茶陵,茶陵自明洪武起属湖广长沙府,故明人常称其为李茶陵或李长沙。他先于翰林院担任编修、侍讲及侍讲学士,后于内阁任礼部右侍郎,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阁、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是明代茶陵派领袖人物,一生著述宏富。其诗文作品《怀麓堂集》是由他生前编订,卒后由门生熊贵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成,杨一清序。明崇祯十年又有《怀麓堂集》抄本,藏湖南图书馆。此后,清康熙二十年廖方达刻四十八年重修本《怀麓堂全集》100卷20册。清嘉庆八年至十四年陇下学易堂与仰斗斋又以此为底本刻《怀麓堂全集》100卷22册,增补东阳年谱7卷,清法式善撰,清唐仲冕增补。其拟古乐府诗集有明魏椿刻本《西涯拟古乐府》,清康熙三十八年岭南刻本《西涯先生拟古乐府》及清乾隆三十二年长沙刻本《拟古乐府注》等。以上述诸刻本为基础,今人所编东阳作品集有两种,即由周寅兵点校的三卷本《李东阳集》(1983)和钱振民辑校的《李东阳续集》(1998),均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两种是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约150万字。然挂万漏一,亦所难免。笔者于专题研究之际,意外获得李东阳佚作4篇,

佚作对研究李东阳的生平、交往和思想都不无裨益。其中2篇得自于茶陵派主要人物谢铎辑《赤诚后集》,2篇辑自山东方志,佚作均有背景来源,故逐录、标点、考证于兹,以期于《东阳集》再版时不无小补。

一、宝庆府知府谢公墓表

吾友谢方石鸣治,书报其叔父宝庆公之丧,以墓表属予。予拉泪泣曰:“嗟乎!公不可作矣。予小子夙奉知遇,联舟比席,书牋相往复,意勤勤不厌,诚不意其遽至此,敢有所孙,不为公身后役哉!”其文曰:

公姓谢氏,讳省,字世修,世居台州黄岩县,今分隶太平县。为宋康乐公灵运之裔,国朝孝子温良之曾孙。祖讳立,考讳全,赠南京兵部员外郎。公以县学生举乡贡士,登进士。历官南京兵部车驾主事、武选员外郎,至湖广宝庆府知府,阶承德郎、奉直大夫,至中顺大夫。在车驾,领马、快舡及太仆孳牧马以百千计,谓为奸利所萃,禄奉外不私一钱。在武选,尝市一奴,后知为武官子,亟还之,仍俾从优给例袭父职。在宝庆,推堂食钱月数缗为公用。条民隐十四事上于朝。以春秋再行郊野,给民牛种多至数百。会府藏所积可支五年,乃简诸生少俊者教之,教于社而公食之者倍其数。又撮朱子《家礼》,并作《十勿》诗,俾民诵习。

收稿日期: 2007-04-20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07CLSZ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TQ020)。

作者简介: 丁延峰(1963-),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文学院古籍所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督民婚丧以拘忌勿举者数家。黜知县二人，籍其赃以代民赋。湖南北称良吏第一。公顾有所掣，谓不尽用，乞为教官，不许，连乞养疾，亦不许。既三年考绩，至中途，上疏径归，当道者交章荐之，而公竟不至吏部。盖公自景泰五年入官，至是为成化九年，年仅五十四而已。民相与刻石记德，越二十年思之不衰。公归，无厚积，割私田若干亩，创为祠堂。岁一率宗人祭始祖之墓。既又与从兄封翰林编修世衍筑会总庵，作敦彝十二会以合族。又立乡约教事，开义学，以教乡之子弟若干人。从子鸣治以翰林侍讲、国子祭酒，两归其乡，公与作望海、仰高、采藻三亭，日夕游眺，大夫士相传为东南名声地。以公号台南逸老，称为逸老先生，鸣治为方石先生。两先生文学论议相上下，名节相激励，自谢氏有孝子、节妇以来，至是乃益显。公所著有《行礼或问》、《杜诗注解》，及诸诗文稿藏于家，而其诗尤清鍊脱俗，为识者所重云。

公寿七十四，以弘治六年十二月七日卒，七年二月朔日窆于桃溪东山之寿藏。鸣治既铭公，又暨其乡士陈儒珮、郭端朝辈，议用吴渊颖故事，私谥曰贞肃。

呜呼！古者官人必言载采采，中世乡评或行覈而月更之，贵实也。公践履施措，有古君子之风，顾进难退易，寡施而多敛，后之人或未能悉也。予故核行指事藉数而书之，以与铭并传焉。

公配宜人王氏。子四：声先公卒，次彩、业、休。孙四：孝、闾、俭、祐。声、彩、孝皆县学生，彩出为公弟王城山人世懋后，公命也。

此文首载《赤诚后集》卷26，后被光绪二十二年（1986）续修《太平县志》卷12《艺文志》二外编（上）收入，1998年温岭市大溪镇桃溪谢氏编刻《桃溪谢氏宗谱》时又将该文收录其中。《赤诚后集》33卷，谢铎辑，明弘治十年（1497）谢铎刻本，该集现存30卷，佚去31至33卷，藏国家图书馆。赤城即今浙江台州，（宋）林表民曾辑有《赤诚集》18卷，专收与台州有关的作品。《赤诚后集》所收则为《郡志》所漏收的有关台州的诗文。谢铎《序》云：“台故有《赤城集》，宋林表民氏之所辑录，凡文章之有关吾台而《郡志》不暇载者咸在焉。”又云：“用是取其自林氏辑录以来，凡为吾台而述

作者，辄次第以为《后集》。”该集共收李东阳文7篇，诗7篇。文章除《南耕王公墓表》、《宝庆府知府谢公墓表》2篇外，余5篇均入《怀麓堂集》。诗则有目无诗，疑佚。其实，东阳未入《赤诚后集》的有关台州诗文尚有《桃溪杂稿序》、《方岩书院记》、《王城山人诗集序》、《谢氏宗谱序》等数篇，均入《怀麓堂集》。

东阳为何写有如此多的与台州相关的诗文？这与台州人谢铎有密切关系。谢铎（1435-1510），字鸣治，号方石，台州桃溪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成化元年（1465）授编修。十四年以家丧归，服除。后与叔父省讲学于方岩书院，从游者众。弘治初，征修《宪宗实录》，乃起供事史馆。弘治四年（1490）乞辞官归。孝宗朱祐樞素重铎，特命擢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祭酒事。十六年修《历代通鉴纂要》。居京五年，乞归养疾。正德五年（1510）卒于家。^①谢铎与李东阳是天顺八年同榜进士，同被选入翰林院作庶吉士，极相友善，终生为友，诗歌唱和，文章应答，从不间断。谢铎与李东阳同为茶陵诗派重要作家，东阳为茶陵派领袖，谢铎则为茶陵派主将，两人为茶陵派的开创与繁荣作出了贡献。谢铎曾将自己所作结为《桃溪杂稿》，并请东阳作《序》。东阳则于《序》中详述两人之谊，云：“予与方石先生同试礼部时，已闻其有能诗名。及举进士，同为翰林庶吉士，又同舍，见所作《京都十景》律诗，精刻有法，为保斋刘公、松岳柯公所甄奖；又见其经史之隙，口未始绝吟，分体刻日，各得其肯綮乃已。予少且劣，心窃愧畏之。同官十有余年，先生学愈高，诗亦愈古，日追之而不可及。然先生爱我日至，每有所规益，必尽肝腑；见所撰述，亦指摘瑕垢，不少匿。及先生以忧去，谢病几十年，每恨不及亟见。”又云：“见所寄古乐府诸篇，奇古深到，不能释手。比以史事就召，尽见其《桃溪杂稿》若干卷，乃起而叹曰：‘诗之妙，一至此哉！’……以交游为幸，因序论之。”^②故罗侨于《桃溪净稿后序》云：“公于西涯李公极加推逊，而西涯于公亦甚敬服。盖二公可谓知己。”^③可见两人之同年同舍甚而意趣投

^①参见《明史》卷163《列传·谢铎传》，第51页。

^②李东阳：《〈桃溪杂稿〉序》，《怀麓堂集》卷28，见周寅兵点校《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3年。

^③浙江临海博物馆藏《桃溪净稿》清抄本残卷，卷末附罗侨《〈桃溪净稿〉后序》，《后序》作于“嘉靖二年癸未二月己亥”。

和之谊非同一般。《桃溪净稿》载有谢铎复答李东阳的书信有17篇，而《怀麓堂集》亦有李东阳致谢铎书十数篇。

同时，李东阳与谢省也有书信来往，《怀麓堂集》载有《复愚得谢太守先生书》（谢省号愚得）即是，又为谢省撰《墓表》、《跋谢氏逸老堂诗卷后》和诗《流河驿怀谢宝庆先生兼怀鸣治侍讲》（《怀麓堂集》卷93）、《至长沙送别谢宝庆》（《怀麓堂集》卷91）等，为谢省弟谢绩撰《王城山人诗集序》，为谢省叔侄主讲的方岩书院作《记》，并为谢氏家族撰《谢氏宗谱序》（《怀麓堂集》卷23）。李东阳在谢铎卒后，还将其中精华选出，编为《桃溪净稿》84卷，由台州知府顾璘刊刻行世^①。由此可见李东阳与谢铎以及谢氏家族之间的密切关系。谢省为谢铎叔父，谢铎十四岁从其学习《四书》、《毛诗》，“学文于先生几三十年”^②，并与之创办、主讲方岩书院^③。谢省为官作人著作都为世人敬仰，李东阳曾作《跋谢氏逸老堂诗卷后》，云谢省“及其功成志，遂引身而退，徜徉容于山林之下，似若甚逸。然而修宗谱，筑祠亭，建义学，议乡约，作敦彝，会见诸诗歌文字间者，无虚岁，则其心与身，亦未始逸也。是先生之逸不以欲乐，而以道宁，岂非古君子之心哉！”（《怀麓堂集》卷33）自然，当谢铎属东阳为叔父作“墓表”时，东阳乐“以与铭并传焉”。据《墓表》所记谢省窆藏时间和《赤诚后集》刊刻时间可知，该文当作于弘治七年至弘治十年之间。谢省墓，在桃溪（浙江温岭市大溪镇桃溪）东，嘉庆《太平县志》卷十四《坟墓》云：“谢太守愚得墓，在桃溪东，与弟王城山人（谢绩）联圻。”墓碑至光绪二十二年（1986）时尚存于“桃溪东山”。光绪《太平续志》卷之十《碑目》云：“宝庆府知府谢公省墓表在桃溪东山，弘治七年明李东阳撰文，载《后集》。今入外编。”有关谢省的存世资料不多，李东阳的佚文为研究谢省的生平事迹和学术以及由此涉及的李东阳与谢氏家族的交游，甚至茶陵派的活动思想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④

①该书卷首即为《〈桃溪杂稿〉序》，《序》后有顾璘题云：“初名《杂稿》，后十三年，西涯先生再取而芟之，俾录为《净稿》云。”

②谢铎《愚得先生文集序》，明正德十六年刻本《桃溪净稿》，卷3。

③李东阳《方岩书院记》，见嘉庆《太平县志》卷15；亦见《怀麓堂集》卷33。

④此文由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政府政志办公室陈士良先生

二、南耕王公墓表

台之黄岩有大族曰王氏，其先出杭之钱塘。唐季有大理少卿从德避地来居，累传至元。临海教谕升，升生士传，士传生世铉，世铉生全禄有德于乡，实生南耕处士。公讳阜，字宗民。自从德居宁溪至公为十有七世。自世铉迁县南门至公为三世。公有子五，孙二十，曾孙十有三。同谱牒者以千数，而其贵且贤者为公之子。和州判封邢部主事，桓公之孙邢部员外郎，今兴化知府弼。公寿既高。会朝廷推恩久天下，八十已上者，赐冠服。有司欲以公奉诏，辞不应。乡之人皆以地望称为南耕处士。年九十乃卒，弘治己酉八月□□也。公生而秀发，有才略。父既老病，家颇蹙，公甫弱冠，辄出应户籍。籍本匠役有工，具为里户所逋。时贵溪周旭鉴知县事，政尚严辨，民死征调者甚众。县符至，族大恐，公曰：“是在里户，令虽猛，而明我其往，告之情毋。”弟准曰：“往必不免。兄死，弟虽在无所与济，请代焉。”公乃以私财输其十之四，俾持以往，且授之辞曰：

“令以某辞问则以某辞对。”比至问答一如公所授，周矍然曰：“良民也！”释而归之，自是待公特优，亦因以重公。公一力起发奋不待助，积勤成裕，以复故业，且益加拓焉。弟早世，妇蒋未三十誓不嫁，公抚其三孤底于成，馭家以礼。置祭田若干亩，每时祭朔望谒已，则集子姓申示劝戒以为常，视诸族虽服属疏远，不失恩意，族人将有事于县，必先诣公，公为理析，往往有不终讼而去者，盖王氏为乡望，而公又其族之望也。夫家之与官，虽有公私小大，其道一也。官必有贤者，长其属则政成，又必久任而不数易，乃可以保于不变。准家亦然，必有贤且寿者长其族，而后兴也。然更任之久，不久系乎君，而人之寿不寿则系乎天。故家之废兴隆替，虽人力所致，抑亦有莫之为者。王之族所以微而复盛，盛而不可穷也，意天以是属之公乎？为公之复继成业，而蒙遗府者，固不可一日忘也。余观翰林侍讲方石谢先生所撰《圻志》，知公德为详，乃用兴化君请表于墓，墓在县东壕头，王氏世所葬地。

公配李氏，先公九年卒，且葬。公卒之，

提供，特此感谢。

年十二月，启竈而窆，因以李附之。

此文载《赤诚后集》卷25。王阜事迹，嘉靖《太平县志》、嘉庆《太平县志》和光绪《太平县续志》均失载。谢铎曾作《南耕处士王公墓志铭》，载《桃溪净稿》卷13，即文中所言“方石谢先生所撰《圻志》”。（明）郑纪撰《东园文集》卷5《兴化郡守王公遗爱碑记》亦有载：“公之祖南耕处士，以礼义倡宗族，立祠堂，置祭田，训子妇耕读蚕绩，禁止奢纵，家门之内若朝廷然。”王弼，王阜之孙，兴化（今江苏兴化市）郡守。谢铎《南耕处士王公墓志铭》亦云王阜有“孙男二十，兴化其一也。”《赤诚后集》，是由谢铎编刻于明弘治丁巳十年（1497）（《赤诚后集》之谢铎《序》题款云“弘治丁巳秋九月朔旦……谢铎序。”）王阜卒于弘治己酉，即弘治二年（1489），因而可知，东阳是应王弼之请写作此文，其时间当在弘治二年至弘治十年之间。

《后集》于弘治十年刻成，在这之前，以谢铎和李东阳的关系，谢铎编入自己的作品，东阳必定是知悉其然。从《后集》刻成至东阳卒于正德十一年（1516），这之间有十九年时间，对于谢铎所编此书，东阳也是有足够的时间阅读的；而谢铎本人作为该书的编者对入选的文章作者，尤其是象李东阳这样的“知己”，是不会出错的。故可以断定，本文的作者为李东阳，勿庸置疑。

三、博平县儒学科举题名记

东昌之博平文献名迹载往牒者，代不多见。明朝建学置官，教化宣著，士多知问学，为科举业。由永乐乙酉至宣德壬子，举与乡者六人。自是不登荐书者六十年矣。成化壬寅，姑苏文君宗儒来知县事，修学舍、广生徒，日与教谕林智训迪策励，期于必效。甫越岁而有举乡者，君慨夫得之之难而惧来者之弗嗣也。乃汇书其科举名氏于石，刻于学宫，以示后进。所向走书京师，请予记。予惟天下之仕者，惟科目得人为多。孝廉失之伪，辟举失之诡，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拘，则其势不得本归之科举，故天下之人皆重之。盖尽民间之选，而后得齿于庠序，尽庠序之选，而后得举于乡，尽乡之选，而后得举于礼部，以为进士。积其几必千百而后得一天下之士，固不俟论，其在州县亦纷乎众矣。而举者不过千百之一，则其势不能以不重，故其所重者示之，使有所慕而后

能自励。录于藩司则一方之士知而慕之矣，录名于礼部，题名于国学，则天下之士知而慕之矣。州县学之有题名也，其亦国监之遗意乎。所谓州县之士者，其学同生之，地又同，而名之成不成殊焉，此其耳目所逮，尤有不容以不慕者，故以天下示之者大，而以一方示之者亲，使天下之士，皆学于乡，皆慕其所及，知感激振奋不能自追，则名不成寡矣。且仕焉必有所用乎世，用焉必有所利乎物，而后无愧于科举之名。苟徒校文字笔墨之长，以阶宠媒利，使天下称之曰某乡某贡某进士某卿某相，此世俗之所谓名，岂士之所恃以自重者哉？夫知科举之重，则不为惰学，知行业之为科举重，则不为虚名，以士之责亦有司劝励之意也。博平乡举之士，若是其艰也，而于进士犹未有闻焉。嗣是以出，其有为名进士为卿相，用世利物焉。天下重者乎，文侯之政可继，则兹石可嗣而建也。文侯以名进士知永嘉，削繁鉏暴，卓有声迹。及知博平，政简不足理，因以其余为学科举之务。若题名云者，观此亦足以征侯之贤，故并书之。

此文载明正德十二年（1517）《博平县志》（八卷二册，现藏国图）卷6《文章类》。题“博平县儒学科举题名记”，次题“翰林院侍讲学士李东阳”。东阳卒于正德十一年，而此《志》由胡瑾、邓恭等纂修于正德十二年，故此文入《志》，署名“李东阳”，不应有误。胡懋仁在其《重修博平县志后序》中云：“予尝观《大明一统志》，宋元间如孙宣公奭……如贾郭诸公，咸登进士，绰有声光，则一时风俗人物，可谓美且盛矣。又尝观东阳李先生《乡举题名记》谓自国朝以来，登乡举者仅六人，进士则寥落闻焉，是可叹也。”又云：“今胡侯（谨）命工椽梓，嘱予序端后，予亦尝忝与纂修列，佔笔筒末，以为观风者之一助矣。……正德戊寅（十三年）春三月既望，成安县儒学教谕，前分博平教事，临海近斋胡懋仁切之书。”再据正德十二年《博平县志·古今宦迹·训导》云胡懋仁“由监生正德四年任（训导）……至十一年升成该县教谕。”可知胡懋仁与正德十一年时曾任博平县教谕，并参与纂修正德《博平县志》，因而作为当时参与编纂、并与东阳同时的胡氏所引用的东阳《博平县儒学科举题名记》，当不会有误。懋仁所引“自国朝以来”句，即东阳《题名记》中“由永乐乙酉至宣德壬子”；懋仁所引“登乡举者仅六人”句，即东阳《题名记》

中“举与乡者六人”。据《题名记》中“成化壬寅……甫越岁……”，可知此文当作于成化癸卯十九年（1483）。此年东阳正为侍讲学士，与文中标题所题“翰林院侍讲学士”正合。

再考李东阳生平，其“立朝五十年”，一生居京，惟三次出行都途经山东^①。其首次出行，是在成化八年（1472），谓请假陪同父亲李淳回湖南。其南行路线由北京沿运河乘船经山东到南京，又沿长江回长沙至茶陵。后重经运河北返。他将这次旅途所作诗文编为《南行稿》。此次沿运河途经山东路线自河北沧州始，经山东东明、德州、武城、临清、东昌（聊城）、张秋、济宁，至江苏徐州；成化十六年（1480），李东阳以翰林院侍讲兼应天府（南京）乡试官。阅卷后，途经山东等地北上，他将此次北上途中所作诗文辑为《北上录》，其北上途经山东路线同上次；^②第三次则是于弘治十七年（1504）四月，奉命前往祭祀山东曲阜的孔庙，于五月回京后，将此次东行之作辑为《东祀录》。三次山东之行使他尽览沿途名胜古迹，结交不少当地名流，写下了约百余篇有关山东的作品，其中散落于山东方志中者共32篇，除此篇及《秦台感怀》外，这些作品都收录到《怀麓堂集》中。东阳作《题名记》时，正是两次南行途经山东之后，由于东阳于朝中身居高官，且诗文已名满京城，故在山东造成轰动效应。时博平（博平，明属山东聊城）人士因博平知县文林力倡科举，“越岁而有举乡者”，故慕名“走书京师”，请李东阳作记。文林，字宗儒，姑苏长洲进士，成化壬寅十八年（1483）补任。正德十二年《博平县志》卷5《官守·古今宦迹》云：“文林，字宗儒，直隶长洲县人。由进士成化十八年任。学博行优，居官勤谨。到任数月，百废俱兴。迁学官以通文运之否，疏河道以弭垫溺之患。政迹甚多，难以悉举。成化二十年升南京大仆寺寺丞。民怀其德，为立德政碑以记之。”卷6《文章类》载有文林撰《博平县儒学先贤祠记》，记其倡导科举、建祠经过。卷7《文章类》又载博平县儒学教谕连江林智撰《县令文侯德政之记》，对文林的事迹有详细记载，所言与东阳文中相符。《怀麓堂集》又载东阳四篇致文宗儒诗文，即七言诗《送文宗儒太仆还南寺》（《怀麓堂集》卷8）、七言诗《送

文宗儒知永嘉和曹时中主事韵》（《怀麓堂集》卷11）、《与文宗儒书》（《怀麓堂集》卷34）、《再与文宗儒书》（《怀麓堂集》卷34），故知东阳与文林并非一面之交。再考东阳类似作品亦不少，如《进士题名记》等，可见东阳也是有意以此举来倡导科举也。

康熙三年，由堵胤、张歙重修《博平县志》。但康熙《志》对正德《志》大加改动，原来的八卷删编为五卷。就此文而言，不仅对原文字句随意窜改，还把作者误成了吴宽。今将正德《志》、康熙《志》及道光十一年《志》所载此文异文列表见文末。

从附表可以看出，康熙《志》对正德《志》改动甚多，《科举提名记》虽不足800字，却改动18处，其中改动句子2个，改字18个，脱字7个，衍字4个。这些改窜与脱衍，有的直接改变了原意或使原句不通。大概因正德《志》东阳文前有吴宽文1篇，故遂录东阳此文时又随手将作者抄成了吴宽。康熙《志》署名为“翰林院修撰吴宽”，但考吴宽生平，此文所署职名与其生平明显不符。《明史·列传第七十二》中《吴宽传》云：“吴宽，字原博，长洲人。以文行有声诸生间。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侍孝宗东宫，秩满进右谕德。”修撰秩满为八年，即秩满时为成化十六年，而《科举题名记》撰于成化十九年，此时吴宽已经离任修撰三年。康熙《志》编纂、抄录之草率、版本之劣差由上可见一斑。道光《志》只有3处从正德《志》，其余皆从康熙《志》，但道光《志》已经意识到康熙《志》作者署名之误，所以又将作者改为“侍讲学士李东阳”。故正德《志》与道光《志》署名为是，信然。

四、秦台感怀

祖龙东去欲乘云，云雾微茫书不分。
漫有神鞭驱海陆，尚余官柳弄朝曛。
柔条不禁行人折，好曲空令异代闻。
见说高台晴更好，一天花絮舞缤纷。

此诗载康熙十二年《东明县志》卷8下《艺文志·诗类》，署“明李东阳”，其诗类按时代排序，此诗前有明杨一清《户牖乡吟》、《秦台感怀》、《单雄信墓》，后有明邑人刘辅《南东明集》。乾隆二十一年《东明县志》卷8、民国二十二年《东明县新志·诗类》卷12亦载。乾隆、民国二志在逐

①参见法式善纂辑、唐仲冕增补《明李文公年谱》，见周寅兵点校《李东阳集》第3卷末。

②参见《李东阳集》中之《南行稿》与《北上录》中有关山东作品。

录时将题目误成“秦台怀感”，“好曲空令异代闻”之“代”字误为“化”。秦台，东明县（今属河北省）古迹。时人过东明必“到此一游”。据康熙《东明县志》卷1《古迹》云：“秦台，在县西南二十里。秦始皇东道至此，昏雾四塞，因筑台以压之，迄今名曰‘秦台’。”后两志则把“西南二十里”，误作“东南二十里。”康熙《志》前有纂修人杨日升《序》，云：“嘉靖丙申陈留高公豫知县事，乃作《志》；越六十余年，蒲城常公澄舟获之，惜乎剗未成耳；厥后李公遇知修于万历之末年；张公福臻补于天启之癸亥；鼎革以来，张公学知又纂缀焉，煌煌乎一邑之文献也。”但此数《志》现今均

已佚去，故不知是否载入此诗，康熙《志》当是最早载入此诗的现存《志》书。此诗当作于成化八年或成化十六年，即东阳前两次出行后。据《怀麓堂集·南行稿序》云：“成化壬辰岁（1472）二月，予得告归茶陵，奉家君编修公以行。至则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处士府君之墓。既合族序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末入见于朝，盖阅七月而事毕。”东阳首次南行历时七个月，但只在茶陵住了十八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旅途游览观光上，又因途经之地，如东明、临清等古迹颇多，所以此次南行以歌咏当地名胜古迹诗篇为多，如临清《鳌头矶》二绝和此首即是，故为第一次出行时所作可能性更大。

正德《志》	康熙《志》	道光《志》
自是不登荐书者六十年矣	“自”为“至”	同康熙《志》
宗儒来知县事，修学舍、广生徒，日与教谕林智训迪策励	脱“修”；“智”为“君”	同正德《志》
得之之难而惧来者……其科举名氏于石	“难”为“艰”，“惧”为“怕”；脱“举”	同康熙《志》
本归之科举。故天下之人皆重之	“本”为“不”，“皆”为“争”	同康熙《志》
得齿于庠序，尽庠序之选，	得齿于庠序之选，由庠序而后得举	同康熙《志》
其在州县亦纷乎众矣	脱“在”	同康熙《志》
州县学之有题名也，其亦国监之遗意乎。	脱“学”；“监”为“学”	同康熙《志》
所谓州县之士者，其学同生之，地又同，而名之成不成殊焉	“所谓”前有“夫”；脱“名”字后“之”字。	同正德《志》
使天下之士，皆学于乡	“士”为“生”；“乡”字前有“其”	同康熙《志》
有所用乎世，用焉必有所利乎物，而后无愧于科举之名	两“乎”字为“于”，“于”为“乎”	同康熙《志》
苟徒校文字笔墨之长	“笔墨”为“墨笔”	同康熙《志》
某乡某贡某进士某卿某相	“贡”前脱“某”，“相”前脱“某”	同康熙《志》
则不为虚名，以士之责亦有司	“则”为“将”，“以”为“虽”；“司”后有“者”	同康熙《志》
而于进士犹未有闻焉	“焉”为“也”	同康熙《志》
削繁鉏暴，卓有声迹	“鉏”为“锄”，“卓”为“早”	同正德《志》
因以其余为学科举之务	“科举”前有“校”	同康熙《志》
故并书之	“书”为“及”	同康熙《志》

The Development About Lost Works Written by Li Dongyang

DING Yan-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s the leader of Cha Ling sect (茶陵派) of the Ming Dynasty, Li Dong-yang has written many books. *Li Dong-Yang's Works* and *Li Dong-Yang's Continuation* which printed by Yue Lu Press in 1983 and 1998 both based the seven editio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ose two works collected almost all Li Dong-yang's poems and articles about 1,500,000 words. But they still had some omits. Today this article supple four literary works which was good for researching Li Dong-yang's life, association and ideology.

Key words: Li Dong-yang; lost works

(责任编辑: 石磊)